

分析与探讨

英国华侨社团的历史演变与当代 华人社会的转型*

班国瑞¹，邓丽兰²

(1. 英国加的夫大学 历史考古系, 加的夫; 2. 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天津 300071)

[关键词] 英国华人; 华人社团; 文化多元主义

[摘要] 历史上英国华侨社团是维系当地华人社会的支柱。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前后, 受列强出卖中国利益的冲击, 英国华侨在民族主义风潮的影响下掀起了组建社团的高潮。抗日战争中, 华侨社团也积极支持了祖国的抗日运动。二战后, 土生华人的成长及香港新界移民改变了旅英华人的构成, 传统宗亲会、同乡会得以复苏, 同时出现了专业性社团、跨国性社团联合及华人社区中心。在当今英国政府的多元文化政策下, 部分华人社团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部分社团却随着第二代华人的本土化而面临着衰落。

[中图分类号] D634. 356. 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5162 (2005) 02- 0060- 07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Chinese Associations and Activities of the British Chinese Community

Gregor Benton, DENG Li_lan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Cardiff University, U. K;

2.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Key words: British Chinese;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s; cultural pluralism

Abstract Historically, Britain's Chinese associations formed a main pillar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During the 1919 Paris Conference and the 1922 Washington Conference, the newly established associations became especially active as part of the worldwide Chinese nationalist response to China's perceived betrayal by the Powers. The British Chinese were engaged in many supportive action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fter the war, the emergence of a new generation

[收稿日期] 2004 09 23

[作者简介] 班国瑞 (Gregor Benton), 英国加的夫大学历史考古系教授, 曾多次访问中国, 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和英国华人研究。

邓丽兰 (1966-), 女, 四川省沐川县人, 历史学博士,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和近现代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研究。

* 本文是英国学术院 (British Academy) 资助的“跨国主义与英国华人社会”课题的一部分, 获得英国王宽诚基金 (K. C. Wong Fellowship)、中英友好基金 (SBFF) 的资助。大英图书馆手稿部、加的夫大学图书馆、伦敦查宁阁中文图书馆、利物浦海事博物馆、利物浦图书馆和英国公共档案馆 (PRO) 提供了相关资料; 英国华人社团侨领赠送刊物、支持访谈, 在此致谢。部分华人出版物未标明出版地, 应系在香港印刷。

of British-born Chinese and immigration from the 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 resulted in changes in the demographic constitution of the community. The traditional associations revived and new organizations such as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transnational associations and Chinese Community Centres were set up. Today, under the British Government's policy of cultural pluralism, some Chinese associations have expanded even further, though others have gone into a decline as a result of the nativization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当前，华人号称英国第三大少数民族，人口超过 25 万。其中英格兰华人超过 20 万，苏格兰约 3 万多人，威尔斯约 4 千人，北爱尔兰约 6 千多人。据 1991 年的人口调查，英国华人出生地分布情况是：香港 34%，土生华人 28%，中国大陆 12%，马来西亚 10%，越南 6%，新加坡 3%，台湾地区 1%，毛里求斯 1%，其他 5%。^[1] 各类社团组织历来被视为维系海外华人华侨团结与文化认同的重要支柱。本文通过回顾英国华侨社团的历史演变与现状，冀以展示社团在英国华人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与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

—

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源起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也是中国人学习西方、抵抗外侮的精神动力。朴素的爱国、爱乡感情以及在海外新式知识分子鼓动下的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充当了早期英国华侨社团活动的催化剂。华侨社团的最初形成与发展，是以民族主义为推动力的。

利物浦是华人侨居英国的最早落脚点之一。早在 19 世纪 80 年代，英国华人中即出现反清组织，这便是在利物浦出现的致公堂。它虽然志在反清复明，但祖国实在遥远，因而它主要致力于处理华侨内部事务。

1906—1907 年间，有不少重要的华侨团体在英国诞生。英伦四邑总会馆在利物浦成立，以“联络旅英梓里感情，增进团结互助精神，共谋事业发展及社会福利，安置及照顾老弱梓里，维护社员正当权益，发扬中国固有文化道德及优良传统，以不涉及政治及宗教为宗旨”。^[2] 同年惠东会馆（后更名正义工商会）在伦敦东区成立，以“联络和加强华侨感情及团结，发展华侨工商事业及福利等”为宗旨。同时，清政府领事馆也在伦敦支持成立了中华会馆。是时，清政府为推动新政，鼓励海外华商建立商会，而英国尚无有实力的华商，故中华会馆主要成为留学生聚会的场所，“经费为学生筹捐，汪使（指驻英大使汪大燮）每年捐英金六百磅以助成之云”。^[3]

20 世纪初，英国蓬勃的工人运动触发了最早的华人工会组织。英国是产业革命的发源地，也是工人运动的摇篮。受此影响，英国华人海员中也出现了最早的工会组织，并在 20 年代前后与国内广东、香港地区的工人运动相互作用与影响。1916 年，利物浦出现 The Chinese Seamen's and Firemen's Association^[4]。因中英文翻译的差异，上述工会团体很可能就是现自称于 1916 年成立的伦敦华侨互助工团。该会早期成员为海员，首任会长为张才，其 50 年代会员证上标注的宗旨为“遵守当地政府法律，联络侨胞互相提携，改良海外工况，发展劳动福利，不忝涉任何有关政治主义之类及其他超出工界立场之活动”^[5]。

早期教会留学生在华人中作了大量工作。除教华侨识字及卫生常识外，也向他们灌输国家观念，并帮助华侨建立社团，“有潘绍棠君者，广东自费学生也。彼身处东伦敦，与水手苦工为伍，不辞辛苦，组织一华工商会以代人觅工，改良恶习为务”。^[6] 华侨社群中知识精英的出现，是新式华侨社团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英国华侨的社团活动进入一个活跃期。当时英国有华侨四千余名，留学生 350 人左右。^[7] 民族危机激发了华侨的爱国情感。1917 年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图提升国际地位，数以万计的劳工被派往欧洲战场，战后少数劳工留在欧洲。但中国却以战胜国身份获

得战败国待遇，巴黎和会上列强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交给日本，由此刺激“五四运动”的爆发，在欧洲华侨与留学生的压力下，中国代表团拒签凡尔赛和约。而1921年底1922年初的华盛顿会议则提供了另一个收复主权的时机。1921年8月16日，留英学生与华侨在伦敦探花楼中国饭店召开留英工商学联合国民大会，会议提出了呼吁太平洋诸国尊重中国主权，撤销在华特权与不平等条约的宣言。9至10月间又在伦敦、利物浦数次聚会，决议致电孙中山，南北一致对外，同时组织赴美监察员，协同美国华侨监督中国代表团的外交活动，并赴荷兰组织分会。原“留英工商学连合委员会”的组织暂时改名为“旅欧工商学监察总会”，以留学生陈源为会长。而参与这一空前的英国华侨政治团体的华侨社团包括伦敦的忠义堂、致公堂、同致公所、东和社、中西社、国民党等团体和利物浦的忠义堂、致公堂、国民党、中西社、客情公所、宁波会馆、四邑会馆、三邑会馆、东平公所、东邑公所、琼崖公会、山东会馆等。华侨骆汉、黄球等人称：“无国即无家，吾人之救国，亦即所以自救”。^[8]英国华侨空前的政治集会后，一个名为“工商学共进会”的组织得以保留。国民党人张道藩回忆：“我在伦敦时期除读书外，和一些同学联络一些知识较高的伦敦华侨组织了一个‘工商学共进会’。除了联络感情之外，最大的目的是要无形中帮助他们革除聚赌、械斗等恶习，鼓励他们改进他们的生活，灌输他们更多的爱国观念。”^[9]

抗战前后，英国华人的社团活动进入一个高潮。以留英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中坚、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和平组织，以巴黎为中心的欧洲华侨抗日组织和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民间抗日团体，都纷纷在英国华人当中设置分支机构及吸收会员，使英国华侨投身于广泛的抗日动员当中，且与英国社会发生了广泛的接触与交流。留学生的抗日组织起着先锋作用。1936年初，中华留英学生抗日救国会发起人会议在伦敦中华协会召开，10月该会正式成立。^[10]1936年9月，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在巴黎成立，王礼锡参与筹备该会，并作为英国华侨代表当选为常务委员。一些同情中国抗战的国际和平组织也纷纷在英国华人及中国发展起附属组织或分支机构。1936年3月，英国知名社会活动家希思勋爵（Lord Cecil）与法国政治活动家在伦敦创立国际和平大会。国际和平大会在中国的分会主席由邵力子担任，而王礼锡则秘密回国赴华北敌后发起建立分会。^[11]同年9月英国援华会成立，王礼锡担任副会长，不少华侨被委派为该会的演讲员，赴英国各地作抗日援华演说，使该会在英国各地设立不少分会。^[12]而一些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日群众团体，也纷纷在华侨中设立分支机构，如民武会伦敦分会、伦敦中国妇女慰劳分会等。一些老的华侨团体，如四邑会馆、互助工团、致公堂等，也纷纷在抗战中出钱出力。

新中国成立后，冷战气氛使华侨与中国大陆的沟通一度变得困难，意识形态的分歧使一些社团组织上趋于涣散，活动趋于停顿。加之旅英华侨人数发展不大，20世纪50年代英国华侨社团的活动一度趋向于岑寂。

五六十年代，港人构成英国华侨的主体，故台湾学者胡志强认为：“香港华侨既因避共来英，将来之英国侨社在本质上应该仍是自由反共的。”^[13]事实则远非如此。英国华人主体来自社会底层，在早年的华人海员中，已有共产党人的活动。而五六十年代的新移民中，不少人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香港独立大队。“文革”前后，受中国国内政治气候及欧洲左翼运动的影响，一些英国华人社团有着积极的活动，如演出样板戏、放映革命电影等。互助工团为在华侨中推广革命化的生活方式，一度禁止在会所打麻将。面对“左仔”、“左头”、“亲中派”的讥笑，他们表示：“互助工团爱国，何来有错？亲中又有什么不对？”^[14]

英国华侨社团的早期历史说明，家国同构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使建立在血缘、宗族、地缘关系上的华侨社团构成英国华人社团的主流。而处于英国社会的底层地位也很自然地使华侨将个人前途与祖国命运相联系，“中国政治”是推动英国华侨社团活动的出发点，空前的民族危机提高了华侨社团在华侨当中的凝聚力与号召力，民族主义是华侨团体产生和发展壮大的精神动力。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因香港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许多世代务农的新界居民无以谋生，而英国中餐业空前繁荣，人工不足，不少新界居民纷纷以家属团聚的方式移居英国。英国华侨人数的增加，促进了英国华侨社团的发展，使其进入新一轮发展期。一些老侨团得以复苏，宗亲会、同乡会勃然兴起，同时出现了专业性、职业性团体、社团联合以及跨国的社团组织。

新移民的加入使一些老的侨团重振社务。如老牌华侨社团共和社在一度沉寂后，自六十年代初起大量吸收会员。为照顾低收入会员的福利，共和社开办廉价食堂、放映廉价电影、卖廉价中药等，并举办各种文化娱乐及体育活动。互助工团原以海员为主，国民党人起着领导作用，但却率先改挂五星红旗，于1962年在唐人街附近的蝙蝠侠街购得会所。各地华侨渴望群体生活，伦敦以外地区的华侨看到互助工团会务兴旺，也纷纷要求参加工团。

一些跨国性的宗亲会、同乡会之类的组织纷纷成立。1965年欧洲张氏宗亲福利会成立。张氏在欧洲的影响可以追溯到20年代英伦的餐饮业。1976年来自香港的文氏族人成立了旅欧文氏宗亲会。1981年时逢香港粉岭村十年一届的太平清醮，英国海外彭氏宗亲会在粉岭村族人的支持下购置了会所。在英国还有廖氏、侯氏、邓氏宗亲会等。

在新界移民中，以村落命名的跨国性社团十分引人注目，如赤径旅欧同乡会、旅欧吉澳同乡会、吉澳渔联会、林村旅欧同乡会、鸭洲联谊会、乌蛟腾海外联谊会等。吉澳岛位于新界东北，大鹏湾西，沙头角之东，50年代有水陆居民4000余人，自香港渔业衰落后，吉澳居民于六七十年代大量移居英国及欧陆。1982年吉澳渔民成立旅欧吉澳渔业联会，设会所于格拉斯哥，首任会长何胜。1983年在狄更斯的故乡漆咸市建立的旅欧吉澳同乡会，首届会长增一。过去吉澳岛上的水、陆居民长期隔膜，互存偏见，现在形成共同的“吉澳”意识，两会联合在格拉斯哥合办天后宝诞，成为当地苏格兰华人的一大盛事。^[15]

各种职业性、专业性社团的出现，使社团的职能开始脱离早期的“全能”状态，而出现职能分化。1968年，英国华商总会成立。该会致力于“联络在英各行业侨胞之感情，守望相助，发展商业前途及不涉一切有关政治活动”。^[16]其他的专业性、职业性团体还包括1982年成立的英国西北华商会，1983年成立的英国北爱尔兰华商会、英国华侨粮油业商会和1988年成立的英国中华饮食业总商会等。除上述商业性社团外，还有一批文化、艺术、学术类社团成立。如1971年成立的英国香港海外专业协会，1988年成立的英国华文作家协会、英国中华艺术协会、英国中华文化中心，1992年成立的旅英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和1995年成立的英国中医药学会等。

各类社团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社团力量的整合。1968年，英国华人社团联合总会成立，文良生担任会长近二十年。最初有19个团体参加，现已经发展到40多个团体。另一个较大的团体联合会是1980年成立的英国华侨团体联谊总会（后简称侨团联合会），由7个华侨团体发起，后增加到30个左右。地区性的华人社团联合会还有1986年成立的苏格兰华人社团联合会，由当地7个华侨团体组成，“经常拜访当地市政府，向市长直接反映华人的情况和要求，尤其是母语教育的经济资助等。”^[17]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种新型的华人社团——华人社区中心出现。这是由英国政府部分资助的华人社区组织，旨在帮助华人获得主流社会的服务。它打破了华人社会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寻求与主流社会的沟通与融合，是华人社群从边缘走向主流、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一个起点。1977年，当第一个华人社区中心在利物浦出现的时候，当地华人的反映是十分冷淡的。而英国媒体则反响热烈。英国《卫报》视之为消除了“二百年来的藩篱”。1980年7月，在伦敦华埠爵禄街也成立华人社区中心，以提高华人社会的地位及改善华人的生活素质，协助华人解决或改善生活上之所需及保存中国文化、艺术及认同为宗旨。游海龙所编辑的《英国华人综览——新

纪元》一书记载的华人社区中心有 79 处，而根据新的统计，“全英国约有二百多个华人社区中心组织，而伦敦区就有超过三十多个”。^[18]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出现了致力于整合、代表全英华人社区中心的全国性组织——英国华人社会论坛 (Chinese in Britain Forum)。该组织“致力为在英华人争取平等机会，享用整体社会资源和服务，并协助华人志愿团体有效地参与志愿服务和社区发展”。^[19] 该会先后获得英国内政部活跃社区组和内政部种族平等组的拨款与资助。目前“论坛”招募了 120 多名会员，其中大部分是机构会员。每年获得拨款约十五万英镑，有两名全职职员与一名兼职职员。继 1999 年召开首届全国会议后，2003 年 2 月在伯明翰召开了以“建立一个生气勃勃的英国华人社区”为题的第二次全国会议。

目前，英国华人社团在数量上是历史上最高的。据不完全统计，计有华人社团 184 个，华人社区中心 79 处，华人宗教团体及基督教团体 102 个，中文学校 110 所。^[20]

三

英国华人社团的历史演变，不仅表现在数量上的增加或规模上的扩大，而且蕴涵着深刻的结构变化。这就是历史上空前的组织结构、功能性质和活动方式的转换。这种变化与英国华人社会正由第一代移民为主体的社会转变为以土生华人及专业技术新移民为主体的社群的进程互为因果，相互影响。历史上，华人社会的利益与权益，是在中华民族主义诉求中获得其正义性的。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则需在多元文化的话语下求得自身利益。促进华人社会的整合与发展，是华人社团应该承担的功能之一。

从组织结构上看，传统华人社团虽在形式上模仿西方社团的章程，设立有董事会、执委会、会员大会一类民主制度的机构，但维持社团运作的仍然主要是“人治”而非“法治”，不少社团靠侨领支撑，会长一职十年、数十年不变，还有人数不菲的名誉会长、永远名誉会长之类，“除了极少数社团有本身的会所，以及依赖物业出租而有收入来源外，多数社团的经济是靠一、两位会长的支持，个人财力始终有限，往往人去财息”^[21]。华人社区中心则基本按照有关志愿团体的组织方式建立，设有专、兼职职员和义工，经费有政府拨款及社会募捐，每年公布年度报告、财政状况，工作人员由专业人士担任，管理上趋向于公开化、专业化、规范化。对于未来的工作也有相当的规划与研究。

而在宗旨与职能方面，华人社团则明显地由关注中国政治转而关注华人社群本身的利益。以著名的华侨社团——共和社为例，该社的创始人是老海员陈天声。陈在利物浦加入英国共产党国际部，与他有过密切接触的中共早期领袖邓发则被视为该会的精神领袖。1947 年该会正式成立时要求“拥护祖国新民主主义建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帮助人民解放事业的宣传任务”。^[22]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共和社改名为共和协会。1968 年香港爆发反英风潮时候，该会部分成员因支持祖国抗英运动上街示威而遭拘捕。60 年代末共和协会从激烈的政治活动中退潮，开始举办中文教育。进入 80 年代后，该会进一步淡化政治色彩，宗旨修订为“团结侨胞，发扬中华文化，宣传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促进中英人民友好及中英文化交流”。^[23] 90 年代，共和协会首创发起全英华人运动会、全英中文学校校运会，成为因专办体育运动而盛名的社团。

第一代移民与第二代土生华人之间不同的社团活动方式，也反映出两类华人社团的兴衰更替。传统社团成为老华侨聊天、搓麻将的地方，而年轻人则更多地活跃于新型华人团体中。在笔者所做的访谈中，刘新、刘中庆父子就是这种趋势的一个典型。刘新祖籍广东兴宁，1957 年从新界沙头角移居英国。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担任共和协会会长。这一时期恰好是共和社由参与积极的政治活动转向中文教育、体育活动的转型期。其子刘中庆是中英混血儿，拥有自己的商务公司，在近年反对针对华人的种族歧视的活动中十分活跃。目前，他是“英国华人社会论坛”最年

轻的董事。^[24]

当前，新老华人社团均面临防止空壳化的问题。老华侨社团主要承担节日庆典、开办中文学校一类的活动，其他大部分社会服务功能已为华人社区服务中心取代，侨领年轻化与吸收年轻一代华人参与是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华人社区中心虽较为活跃，但也有令人担忧之处。199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77%的被调查者认为社区中心与其生活不相干。在知道当地有社区中心的被调查者中，也有三分之二的人从来没有进去过。50岁以上的华人比年轻人更喜欢去；16~29岁的年轻人当中，有五分之四的人从来没有去过。土生华人比移民一代更少去社区中心。^[25]显然，在贴近华人切身利益方面，社区中心还有待改进之处，特别是要避免沦为少数人谋利益的手段。在这方面，有的华人工作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如认为有的华人社区中心以各种名义申请经费，但实际上却不做事或做假事，“申请政府资助是手段还是目的才是真问题”。^[26]

新一代土生华人的成长刷新了华人社群的价值理念。继早期跳船海员、新界移民后，土生华人与技术型新移民正在成为英国华人社会的骨干与主体。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上的传统社团正逐步趋向于式微，英国政府部分资助的华人社区中心正取代传统社团的社会服务功能，在华人社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对于英国华人社团的发展趋势，有的华人工作者指出：“根据华人社团目前的动态分析，它将朝着国际化、权益化、当地化的方向发展”。^[27]有的研究者认为战前海外华侨社团具有广泛性、权威性、自治性的特点，而“当代华人社团正处于动态化、分立化和多元化的发展过程之中”。^[28]华人社团的发展前景，取决于它们在融入英国主流社会与中英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

进一步融入主流社会，是华人社团的重任之一。在主流社会中，华人还需更积极地面对种族关系的政治，积极利用当地多元文化政策的资助。因为维护华人的根本利益，仍需英国政府的支持与帮助。一位侨领说：“在新的纪元社团需要多介入英国的生活方式——政治和社会福利体系等。我们不可在英国30年或40年，却说不知道英国的情况，我们需要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知道我们社区的需要，我们必须做调研，了解我们社区的需要”^[29]。这是较为清醒的认识。

英国是法治社会，保障华人的利益通过法律途径是必然的选择。一些华人团体对此有成功的经验。如雪埠华人社区中心为获得政府对其健康计划的支持，援引英国《种族修改法案二000》的精神，向当局陈述种族平等的责任及社团在协助华人社区使用主流服务时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从而成功地获得继续资助。处理该案的黄伟平表示：“华人社群处理问题是以‘情’先行，‘理’、‘法’跟进，西方社会则是以‘法’先行，一切依法办事”，“故要保护弱势社群，一定要适应立法，将权利明文规定下来。”^[30]另一通过立法维护华人权利的例子是中医界。英国拟对“补充医学”立法，拟议中的方案将针灸、中草药分别立法管理注册，并可能推广至欧盟范围。这对中医针灸与草药结合治疗的传统方式不利。中医界于2002年12月在伦敦集会，决议成立“欧洲中医药独立立法论坛”，援引澳、加、美等地中医独立立法的先例，以推动中医独立立法运动。英国中医界的这一构思，获得意欲推动中医国际化的中国政府的支持。^[31]而一些华人社团的法律知识甚少，对英国政府对少数族裔文化的优惠政策不了解，不利于争取华人的利益。

有的华人社区工作者更进一步认识到，整合性发展可以增强华人社团的力量。有研究者提出建立“华人志愿服务议会”（Chinese Voluntary Service Council）的主张。该项研究认为，英国华人缺乏统一的代表性机构，导致与英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沟通及施加影响的困难。各个华人志愿团体之间各自为政，不仅缺乏合作与资源共享，有时为争取项目拨款而相互竞争。设想中的这一机构是英国华人社区的代表团体，负责研究及计划符合华人需要的社会服务，统筹华人社区机构的服务，提供华人社区员工的培训等。^[32]

此外，华人社团也应摒弃山头主义和门户之见，树立一种“泛中华理念”。由于历史上华人主要来自广东地区，中华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南粤文化，而随着移民构成区域的扩大，华人

社会内部的利益竞争与势力角逐也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激化。华人社团的居间调解、协调作用显得更加重要。如面对中餐业的饱和与华人就业出路问题,除竞争主流社会的技术职位外,与民族文化相联系的“中华文化产业”也许是一个吸引人的前景。但这很大程度取决于华人社会文化素质的提高。中华文化的内涵并不只是龙灯、石狮子、红灯笼,没有文学、艺术的族裔要想在多元文化的社会里占有一席之地是不太可能的。因此,富有文化底蕴的泛中华理念,应该是当代英国华人社团的共同认知与凝聚力所在。

[注释]

- [1] David Owen, *Chinese People and "Other" Ethnic Minorities in Great Britain: Social and Economic Circumstances* 1991 Census Statistical Paper no. 8, Coventry: Centre for Research in Ethnic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Warwick, 1994. p. 2
- [2] 利物浦四邑总会馆:《四邑总会馆八十周年纪念特刊(一九零六年至一九八六年)》,1986年,第32页。
- [3] 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走向世界丛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0页。
- [4] PRO, HO 45 24683.
- [5] 伦敦华人互助工团:《伦敦华人互助工团八十五周年纪念特刊》,伦敦:2001年,第78页。
- [6] 《留英华人近况一夕谈》,《旅欧杂志》第9期,1916年12月5日。
- [7] Mir ch' ien T. Z. Tyau, *London through Chinese Eyes, My Seven and A Half Years in London*, London: 1920. pp. 305- 306.
- [8] 《伦敦通信——英伦华人热心国事之经过》,《申报》1922年11月16、17日。
- [9] 张道藩:《酸甜苦辣的回味》,台北:《传记文学》1卷6期,1962年11月。
- [10] 《留英中国学生大团结》,《救国时报》1936年12月10日。
- [11] *Cecil Papers*, Add 51183, f139 - 141, British Library, Manuscripts.
- [12] *Activities of the China Campaign Committee, China Bulletin*, No 2, Nov 30, 1937.
- [13] 胡志强:《英国华人概况》,华侨协会总会主编,台北:正中书局印行,1989年,第54页。
- [14] 伦敦华人互助工团:《伦敦华人互助工团八十五周年纪念特刊》,第38页。
- [15] 吉澳村公所值理会、旅欧吉澳同乡会、旅欧吉澳渔业联合会:《大鹏明珠吉澳——沧海遗珠三百年》,联合出版,香港:2001年,第86页。
- [16] 《英国华商总会会刊》1993年总第6期。
- [17] 常恺:《生气勃勃的苏格兰侨界——访苏格兰华人社团联合会会长曾庆如先生》,《欧华》第6期,1992年8月。
- [18] 《华人社区中心前路茫茫》,《星岛周刊》2003年3月15日。
- [19] 《英国华人社会论坛·回顾与前瞻》,《英国华人社会论坛》,2001年,扉页。
- [20] 游海龙:《英国华人综览——新纪元》,香港:亚美企业有限公司,2001年,第192- 216页。
- [21] [29] 游海龙:《英国华人综览——新纪元》,第40、46页。
- [22] [23] 英国共和协会:《英国共和协会五十周年纪念特刊》第44、47页。
- [24] 邓丽兰2003年2月24日在伯明翰对刘新、刘中庆父子的访谈。
- [25] Laura Piston: *Social Contact and Social Support: Health and Life Styles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England*, London: Health Education Authority, pp. 159- 175.
- [26] 《华人社区服务申请资助困难》,《新界线》第43期,2003年2月。
- [27] 宋冠珍:《华人社团发展的三个趋势》,《欧华》第6期,1992年8月。
- [28] 李明欢:《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8页。
- [30] 英国华人社会论坛:《华人论坛季刊》,2002年冬。
- [31] 《中医界组成统一战线争权益》,《新界线》第42期,2003年1月。
- [32] 伦敦华人社区网络、英国华人社会论坛、林肯大学政策研究中心:《伦敦华人社区机构目前需要及未来发展研究报告》,伦敦:2002年7月,第11页。